

江南运河与唐前期江南经济的面貌

张剑光

(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, 上海 200234)

[内容提要]隋炀帝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江南运河进行了开阔、疏浚,同时对江南运河沿岸的驿站、码头、桥梁等交通运输体系进行了建设。唐代前期,运河沿线各州继续完善运河的功能,确保了运河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。运河的畅通,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水系,将江南和淮南、中原连成一体,江南对全国的意义逐渐显现出来。运河在唐前期,对粮食和各种物资的运输、对各种人员的往来、对农业灌溉和水稻种植、对沿河城市的发育成长,其作用越来越直接。运河对江南经济发展的推动,直接导致了唐前期江南经济已建立起稳定的发展基础,江南经济的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准。安史之乱后,中央政府把财赋中心移到了江南,南方大量粮食运向北方局面的形成,与江南运河的促进作用是密不可分的。

[关键词]江南运河;唐前期;修整;作用;经济面貌

[中图分类号]K242

[文献标识码]A

[文章编号]1000-422x(2014)04-0015-13

研究唐代的江南经济,都会注意到中唐以后江南在唐朝经济中的重要地位,认为江南成了唐朝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,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。这样的观点在唐人的文章中早有表达:“江东诸州,赋出所资,漕挽所出,军国大计,仰于江淮。”^①说明江南稻米是唐王朝主要的粮食依靠。韩愈在《送陆歙州诗序》中更是强调:“当今赋出天下,江南居十九。”^②杜牧也说:“三吴者,国用半在焉。”^③指江南对唐朝财政的支撑几乎达到一半。不过,人们在研究唐后半叶江南经济的重要地位时,往往疏忽江南运河在隋末开凿后对唐朝前期江南的影响,没有充分认识到江南运河对唐前期社会经济的作用,更无法了解唐代前期江南经济发展的真实面貌。本文试就上述问题进行一些探索,不当之处,请方家多提宝贵意见。

隋唐“江南”所指的地域概念有宽有狭,本文所指的江南主要是指唐前期江南东道的核心部分,约相当于今苏南和浙江的范围,但在具体论述时,主要以江南运河沿线的润、常、苏、杭四州为例加以说明。

一、隋朝江南运河的开凿

江南运河是隋代大运河的最南一段,北起京口,南抵杭州,纵贯太湖流域,是江南北部的交通大动脉。根据前人的研究,这条运河的开凿可以上推到春秋时期的吴国。^④《史记》卷29《河渠书》云:“于吴则通渠三江、五湖……此渠皆可行舟,有余则用溉浸。”这条吴地的“渠”,显然指的是运河。学者认为苏州至吴淞江、苏州至无锡间的运道,吴国、越国的时候已经开通,而今镇江至丹阳段的水道秦时开凿。^⑤《史记》卷6《秦始皇本纪》谈到始皇三十七年,“浮江下,观籍柯,渡海渚,过丹阳,至钱唐,临浙江”,估计是从长江东至丹阳城,然后再往东南至今浙江境内。至公元一世纪前后,江南运河已基本贯通。孙权赤乌八年派陈勋带将士三万凿句容中道,清王鸣盛曰:“今水道自常府城外经奔牛、吕城以至镇江府丹阳县城外,自此再西北,行至府治丹徒县城外入江。此道大约当吴夫差

[收稿日期]2014-10-06

尚未有,直至孙权方凿之。……丹徒水道,入通吴、会……自今吴县舟行,过无锡、武进、丹阳,至丹徒水道,自孙氏始。”^⑥显然,运河的北段,由于地势较高,为确保运道畅通,六朝时期一直是整治的重点。隋朝建立前,在江南实际上已经有一条各个朝代分段开凿和整修的运河,不过估计河道还没有完全疏通,阔狭不一,水位有高有低,想完全畅达地从长江运输货物至浙江,还不能轻易做到。

江南运河的全部疏通,是在隋炀帝时期。《资治通鉴》卷181记载,炀帝大业六年(610)十二月,下令开凿江南河:“自京口至余杭,八百余里,广十余丈,使可通龙舟,并置驿宫、草顿,欲东巡会稽。”十二月是江南一年中最冷的时候,地冻天寒,因此真正的动工肯定是要到来年的春天。关于此条材料,《隋书》没有记载,应该是唐初史官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,或者说工程量并不是特别大,对江南社会的影响并不严重。元末《无锡县志》卷1《津梁》谈到大市桥时说:“一名通济桥,跨运河,隋大业八年二月建。”建桥以前,运河工程应该已经完成。因此最起码可以这样认为,无锡段运河大约在大业七年中已经修成,最迟不会超过大业八年二月。从唐初开始,唐代人对隋炀帝的奢侈和暴政不断进行批判。唐代后期,更是出现了《海山记》、《开河记》和《迷楼记》这样的演绎小说,增添了炀帝很多情迹和具体的细节,但都没有涉及到炀帝开江南运河。这可以说明,江南运河开凿时动用的人员数量还是有节制的,工程是在有组织有秩序的情况下进行的,人民的反感程度不是很高。

虽如上述,但并不是说隋朝开挖江南运河是不存在的,或者说只是对前代河道简单的疏浚。事实上,隋朝开江南河历代都认为是存在的,而且强调对江南交通和经济有很大的贡献。陆游《入蜀记》谈到:“自京口抵钱塘,梁、陈以前不通漕,至隋炀帝始凿渠八百里,皆阔十丈,夹冈如连山,盖当时所积之土。朝廷所以能驻蹕钱塘,以有此渠耳。汴与此渠皆假手隋氏,而为吾宋之利,岂亦有数邪?”^⑦隋朝开挖的河道,至宋朝还有遗迹,丹阳段挖土堆成山。

《通鉴》记载隋炀帝开凿的江南河“广十余丈”,按隋小尺合今24.6厘米计,十丈为24.6米,“十余丈”取其中,以十五丈计,平均河面宽在36米至37米左右。又元《无锡县志》卷2云:“运河,……胜七百石舟。……自京口至余杭郡八百余里,水面阔十余丈。”河面能通行装载七百石的船只,相当于今六七十吨重。如此的载重量,船只的吃水肯定有数米深。江南运河是为了通行炀帝的龙舟才开挖的,而《通鉴》卷180大业元年八月条谈到隋炀帝所乘坐的龙舟,上下“四重,高四十五尺,长二百尺。上重有正殿、内殿、东西朝堂,中二重有百二十房,皆饰以金玉,下重内侍处之”。虽然江南运河最后没有通行龙舟,但也大致可以知道河道的宽度和深度在开挖河道的时候肯定是有-定要求的。

作为运河的配套工程,隋代修建了驿宫和草顿。驿宫应是驿站,不过是驿站中最高级的一种,房子建造成宫殿一般,最初的考虑可能是为了炀帝上岸休息。草顿大概是临时性的简易休息场所。不过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,隋唐江南运河沿岸馆驿有确切建造时间的很少,明确说建于隋代的只有望亭驿。此驿位于无锡东南五十里,离苏州也约五十里。史云:“望亭,在吴县西境,吴先主所立,谓之御亭。隋开皇九年置为驿。”^⑧大业间开挖运河,是否对望亭驿再加以修缮,史书没有明确记载。从润州经常州、苏州至杭州,江南运河沿岸可知的唐代驿站有三十多个,其中一半左右在唐代前期的资料中已经出现,这些驿馆中肯定有一些是建于隋代的。

根据后代的一些运河配套设施来推测,学者认为江南运河疏浚时,“沿途的码头、渡口、纤道、桥梁等设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”。^⑨除了前引通济桥外,隋代在运河修成后也建了一些桥梁。如《咸淳毗陵志》卷3谈到常州武进县的陈渡桥,“在县南广化门外四里,跨西蠡河。旧传隋陈司徒建”。再如无锡县的梁溪桥,“在县西五十步,跨梁溪,通大湖,隋大业中建”,应是运河的配套桥梁。江南运河疏浚后没几年,隋朝就灭亡了,因而隋朝建设的桥梁并不是很多。

关于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,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探讨,炀帝是否纯是为了东巡会稽追求个人享乐而决定开河?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开凿江南运河的动机可能不会这样简单,我们推测可能与江南地

区经济、政治的发展有关,当然与炀帝的个人主观动机也有关联。其一,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,向炀帝提出了开凿运河的现实要求。早在南朝刘宋时就有人说:“江南之为国盛矣,……地广野丰,民勤本业,一岁或稔,则数郡忘饥。会土带海傍湖,良畴亦数十万顷,膏腴上地,亩值一金,鄠、杜之间,不能比也。荆城跨南楚之富,扬部有全吴之沃,渔盐杞梓之利,充仞八方,丝绵布帛之饶,覆衣天下。”^①经过南朝的开发,南方经济在不断追赶北方。由于关中地区人口密度较高,农业生产总量有限,并不能全部解决京师的粮食供应,必须仰仗各地的漕运。隋平陈后,对江南的粮食自然不会撇置不管,炀帝不会仅以江南行政上的归属作为统治的终极目标,沟通南北经济交流可能是他最终的想法。其二,江南地区的重要政治地位也是开凿运河的一大原因。江南原是陈朝统治的中心地带,陈亡后第二年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,隋朝平叛所用时间比灭陈还要长。平叛结束后,隋文帝令杨广坐镇江南达十年之久,这充分说明了隋朝统治者对江南的重视。开运河的前一年,炀帝对给事郎蔡征说:“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,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,坐深宫,不与百姓相见,此何理也?”蔡征对曰:“此其所以不能长世。”^②也就是说,炀帝认为一个帝王只是坐在皇宫中是不行的,必须深入到百姓之中,要到江东巡狩,才能巩固统治。尽管江南运河开凿后,炀帝没有过江,更没有到会稽,但从政治动机而言,帝王出巡对有效控制地方是十分有效的,会使老百姓产生强大的向心力。其三,从军事角度看,江南地区河网交织,擅长造船,一旦叛乱,水战是其特长,而且还会躲避于海上孤岛。开皇十年高智慧叛乱,与隋军战败后就逃至海上,而隋军要彻底消灭叛军,必然要用水军去对付。从平陈到杨素平叛,或从海道,或从山阳渚入扬子津来到江南,政府的水军发挥出了积极有效的作用。因此,开凿江南河实际上就是为应付以后军事不测所作的一种准备。其四,就炀帝个人来说,到江南巡游享乐是开凿江南运河重要一个原因,这个是不用隐晦的。炀帝刚登帝位,就“发大江之南、五岭以北奇材异石,输之洛阳”。^③他“课州县送羽毛,民求捕之,网罗被水陆”。^④他开凿大运河的其他几段,是为了自己巡狩享乐,巡幸江都时,大事铺张,极尽奢靡之能事。开江南运河,应该是延续了以前的做法,想到苏杭和会稽去巡幸,只不过国破身亡来得快了一点。

不过,不管隋炀帝当年是出于什么目的决定开挖江南运河,但客观上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。他为江南地区疏浚了一条十分有用的河道,这条河道既宽又长,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一定意义上说,这条运河改变了江南经济的走向,成就了江南历史发展的命运。

二、唐前期江南运河的维护和修整

江南运河虽然在隋末通航了,但至唐初在运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,为了保证全线运输顺利通畅,人们在很多方面作了努力。

在运河上建设堰、埭和闸,这是当时最有效的维护航道通行的方法。运河通航后,要通行数百石的大船,必须保证有一定深的水位。运河长达八百里,而从润州到常州、苏州、杭州,各地的海拔有高有低,即使同一地区内,地势起伏也会较大,这样运河各段就存在着较大的水位差。为保证各河段一定的水位标准,不使河水都往海拔低的地方流,唐代江南百姓通过在河中修筑土坝或石坝的办法拦阻河水。这种土坝或石坝当时称为堰或埭,即修筑一种横截河渠的坝基,使水从坝上漫过,因为将土或石坝修成了一定高度,就能抬高水位,控制河水的流失量。堰埭设立后,各段河道水位有了确保,就能维持河道通航。虽然船只通过堰埭时比较麻烦复杂,但不需要将货物全部搬上岸,通过一段陆上交通后再装船,整个航道仍能畅通无阻。这一办法,并非唐朝首创,六朝就已十分盛行。早在东晋时,京口至丹阳的水道上设立了丁卯埭:“晋褚裒镇广陵,运粮出京口,为水涸,奏请立埭,以丁卯日,后人构桥,因名。”^⑤唐朝因地制宜,将这种水利技术传承了下来,在江南运河上设置了多个堰埭及水闸,其中最主要的有:京口埭,陵亭埭,望亭堰、闸,长安闸。

京口埭在润州城西北京口港,距江一里左右。宋朝人认为“唐漕江淮,撤闸置堰”,^⑥意谓这里原来是闸,但为了运输更方便,唐朝改立成堰。《万历丹徒县志》卷2说此堰置于唐朝,但“莫究所

始”，具体建立年份不详。宋之问《登北固山》云：“京镇周天险，东南作北关。埭横江曲路，戍入海中山。”^⑧孙逖也有《下京口埭夜行》诗。^⑨因此京口埭设立于唐前期是可以肯定的。《神仙感遇传》谈到：“韩滉廉问浙西，强悍自负，常有不轨之志。一旦，有商客李顺泊舟京口堰下……顷之复在京口堰下，既而诣衙投书韩公……”^⑩韩滉是唐德宗建中二年到浙西任职的，京口堰早已存在，可以推定此堰的设立必在唐代前期，而且时间较早。^⑪凌亭埭，在丹阳县东约四十七里处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25云：“今置埭。”可知埭设立于唐朝。由于丹阳以东地势渐低，凌亭埭的设立对保证运河丹阳至润州段水位的意义十分重大。《太平广记》卷44引《河东记》谈到贞元中已有凌亭埭，“舳舻万艘，隘于河次，堰开争路，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”，因此很可能此堰是建于唐前期。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凌亭埭是定时开放的，可能是以水位的高低作为开放的依据，埭旁已开设了逆旅招待船主人住宿。

望亭堰、闸，在无锡县西四十五里，据《咸淳毗陵志》卷15《堰》记载，宋淳化元年（990）诏废望亭堰，所以此堰建于唐五代是可以肯定的。同卷《闸》又据《风土记》谈到望亭闸：“隋文帝至德初置。”至德为陈后主叔宝的年号，有可能此堰最初建立于陈末隋初，以后又不断加以修治。长安闸，据《咸淳临安志》卷39《水闸》云：“长安三闸，在（盐官）县西北二十五里，相传始于唐。”该书又云长安闸就是义亭埭。唐代在运河南端的长安镇设闸节制水流，并疏导西湖水入运河。不过闸设立的具体年份，未见史料明确记载。此外，《通鉴》卷261唐昭宗乾宁四年四月谈到嘉兴有驿亭埭，疑此埭是设立于运河之上，具体建埭时间不明。《咸淳毗陵志》卷15《堰》谈到常州西二十七里有奔牛堰、闸，从苏东坡有“卧看古堰横奔牛”句，此堰的设立有可能是在唐朝。无锡县城西南有梁溪，南北长三十余里，与运河相交，为保证运河水不从梁溪中流失，时筑有将军堰。传说是唐将军单雄信提兵路过此处，“以枪止水为堰”，后景龙二年又在运河的北岸置闸。^⑫由此可知，为保证运河顺利通航，确保一定水位，唐五代时期在运河上设立了为数不少的堰埭和水闸，同时在与运河相交的河道口也设堰闸，以防过多的运河水流失。

为了保证运河水位，人们还将其它湖泊的水源引进运河。运河丹阳至京口段，地势较高，河面浅狭，早在唐以前人们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，遂将河床挖深，但水流仍时常不足。这一段运河水主要靠丹阳附近的练湖水补充水源，“官河水浅，又得湖水灌注，租庸转运及商旅往来，免用牛牵”。^⑬后人曾说：“湖水放一寸，河水涨一尺。”^⑭这段运河依靠了练湖水就能确保通航。

此外，对江南运河还进行了疏浚和改动入江口等办法来保证运输畅通。元《无锡志》卷1《津梁》谈到无锡南市桥时说桥跨运河，“唐武德中凿运河时建”。这条资料，与南宋的《咸淳毗陵志》记载相同，估计出于同源。如此看来，无锡附近的运河在武德间再次进行了疏浚，估计是在隋朝开凿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整，并不是新开运河。《无锡志》卷2《总水二之二》又云：“运河……胜七百石舟……自唐武德以后至今累浚，为东南之水驿。”可知唐初武德间无锡的疏浚肯定是存在的，而且不只一次。运河的入江口隋唐前期在丹徒，而时长江江面宽达四十里。不过随着润州段长江主泓道的变迁，上游江水挟带而下的泥沙，在运河入江口淤积越来越多。北岸扬州段江面积沙更多，沙洲不断上涨，渐渐露出水面，并渐渐与江北合拢，至开元时洲上已有百姓安居，江面变狭，仅为二十余里。开元二十五年，齐浣任润州刺史，因“润州北界隔吴江，至瓜步沙尾，纡汇六十里，船绕瓜步，多为风涛之所漂损”。为减少漕船在江中迂回航行的风涛危险，“乃移其漕路，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，即达扬子县。……又立伊娄埭，官收其课，迄今利济焉”。^⑮这样，运河的入江口从丹徒移至京口埭。李白曾有诗歌颂这件事说：“齐公凿新河，万古流不绝。……两桥对双阁，芳树有行列。……海水落斗门，潮平见沙汭。”^⑯新入江口的建立和江北伊娄河的开凿，使来往运河的船只较之前更为方便。

因为运河是江南水上骨干通道，所以唐前期持续不断地进行维护和修整，说明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运河的作用。这种对江南运河通航能力的维护，必将对江南经济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。

三、江南运河对唐前期经济发展的作用

隋朝开通了江南运河,到了唐代前期又采取了不少措施保持河道通畅,这表明江南运河的通航是有着充分的现实需要。那么,江南运河对唐前期江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效应?

唐末诗人皮日休在《汴河怀古》一诗中说:“尽道隋亡为此河,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,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^⑧虽说的是汴河,但用到江南运河头上同样是十分适合的。尽管炀帝挖河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通行龙舟,但在后人看来他挖河的功绩比禹还要大,至唐末大家都在依靠着这条河流的运输。

大体上说,江南运河对唐前期江南经济发展的作用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1、使江南与淮南、中原紧密地连成一片,同时拉近了闽、岭南与中原间的距离。江南运河开凿后,南可通钱塘江,江南东道的几个地区相互粘合得十分紧密;北可通过山阳渎、汴河与淮南、中原地区连接起来。武则天时期的崔融曾描述唐代的交通:“四海之广,九州之杂,关必据险路,市必凭要津。……且如天下诸津,舟航所聚,旁通巴、汉,前指闽、越,七泽十薮,三江五湖,控引河洛,兼包淮海。弘舸巨舰,千轴万艘,交贸往还,昧旦永日。”^⑨按他的意思,唐代整个交通格局中,闽、越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之所以他有这样的观念,与隋朝大运河沟通后,由中原经运河,在扬州过江,通过江南运河来到闽、越,这样就将淮南、中原和江南连成一体,进而向南经钱塘江进入闽、广,又把江南和闽、广连接进了国家核心区域。

将江南与淮南、中原地区串连成一片的是运河。这种连接的需要,实际上在南朝就已经出现。永嘉以后,中原板荡,北方移民有许多人就是沿着泗、楚、扬到达晋陵和京口地区。如祖逖“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”,后“居丹徒之京口”。^⑩隋朝灭陈时,贺若弼率领的一路大军从广陵渡江进入南徐州,在攻克建康后就挥师直下晋陵和吴州。^⑪隋朝平陈后的第二年,陈朝旧地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隋运动,隋政府派杨素前往镇压,杨素率舟师自扬子津渡江进入江南,一路从晋陵、无锡、吴州镇压下去,深入东阳、乐安、永嘉,直至打到泉州平定叛乱为止。^⑫这个时候,江南运河还没有沟通,但实际上当时的交通线路已基本沿着运河的走向通至江南纵深。自隋朝江南运河沟通后,由此向北通过山阳渎和通济渠,可直达中原。

江南运河将江南和淮南、中原串联起来的作用,对唐政府来说最初是并未充分意识到的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江南运河的作用越来越明显,政府明白了将江南作为经略东南的重要意义。皮日休有诗谈汴河说:“万艘龙舸绿丝间,载到扬州尽不还。应是天教开汴水,一千余里地无山。”^⑬他认为从汴河到扬州,一千余里变成一体,将中原和淮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。而过了长江进入江南运河,江南和淮南亦连接了起来。有人曾说:“汴水通淮利最多,生人为害亦相和。东南四十三州地,取尽脂膏是此河。”^⑭其实就是很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。

2、为人员往来、粮食货物的运输提供了便利。江南运河作为全国性的水上通道,是江南最主要的航道。江南运河北可进入山阳渎,中与长江相交,南与钱塘江相连,是全国水运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隋朝疏通江南运河,大大改善了运河的通航条件,唐朝大受其益,江南的物资大多经运河北上运往中原。江南运河沿线数州,大量的货物都是直接装船运向北方。即使是浙东地区,也是通过钱塘江、浙东运河再折入江南运河与中原地区紧密联系起来。唐朝前期,江南的粮食、赋税和其他货物,已大量地通过江南运河运向北方。在洛阳含嘉仓,曾经出土了八块武则天时期的仓铭砖,内中有一块是苏州的,记有“苏州租糙米”字样,说明其时的苏州粮食已作为租米运到洛阳储存。^⑮苏州租米的运输路线,肯定是经江南运河运向北方的。开元年间,曾设立了管理漕运的专门官员转运使。政府第一次设立转运使在开元二十一年(733),“拜(裴)耀卿为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兼江淮都转运使”。^⑯此后为转运粮食,唐政府屡设转运使,每年漕运南方上百万石粮食至北方,而

这些粮食,大部分来自江南东道,是经江南运河运向北方。裴耀卿曾向玄宗提出改造漕运的办法,其疏中说:“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,然送租庸调物,以岁二月至扬州……入斗门。”漕船一般来说是从江南运河再过江,从扬州入山阳渚到达北方,漕米往往是在江南运河的沿岸装上船的。他又说:“江南租船所在候水,始敢进发,吴人不便河漕,由是所在停留……臣请于河口置一仓,纳江东租米,便令江南船回。”^⑧按照他的说法,江东租米装上船,由吴人运输,运粮的船叫江南船。这里他江东、江南、吴三个概念混在一起使用,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,却使我们看到米是运河沿岸装船后,百姓沿运河往北运向中原的景象。再如天宝年间,缙云郡司法参军王元钦,“遵为纲使,统税陈留”,负责押运本州的租赋到中原,但“隙驹以往,吴郡染疾,见歿睢阳……浮离县河次,在船而终”。^⑨处州租赋在浙江沿岸装船后顺流而下折入运河,至苏州时王元钦得病,在汴河边上的宋州睢阳郡去世。

行旅往来,经江南运河这一通道既舒适又快捷。延陵人包隰“因选,溯舟于隋河”,就是曾乘船从江南河中由曲阿、润州过江赴选。^⑩《太平广记》卷29引《原化记》“李卫公”条云:“苏州常熟县元阳观单尊师,法名以清,大历中常住嘉兴,入船中,闻香气颇甚,疑有异人,遍目舟中客,皆贾贩之徒……”从常熟至嘉兴,所走路线当先到苏州,再沿运河南下。李翱自中原前往岭南,到达扬州后,渡过长江经润、常、苏、杭进入浙江,一直往南,“自润州至杭州八百里,渠有高下,水皆不流”。意谓运河中埭堰将各段河道水位调整得高下错落,不因为地势的高下水流湍急,行船十分方便。^⑪这几条虽是唐中期的情形,但想必唐前期的通航情况已是如此,说明运河对江南人民生活带来的益处是难以估量的。

3、为江南农业灌溉和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唐文宗大和年间,白居易来到两浙地区,他描绘一路上所见说:“平河七百里,沃壤二三州。”自注云:“自常及杭,凡三百里。”^⑫虽然这是唐后期的景象,但他谈到的却是运河沟通后对周围地区农业的影响,自常州历苏州至杭州,沿运河往东南,一路上全是沃壤之地,依赖了运河,周围农田得以灌溉。

清人曾经论述到江南运河苏州段的修筑,对太湖东部地区的影响:“当时开浚河道,其深阔者固无处加工,至浅狭浮涨处,其土必堆积两旁,想塘岸之基始于此。”^⑬隋朝开凿江南运河,将挖出的泥土堆在河的两旁,成为此后太湖东部吴江塘路的基础。太湖东部本来地势较低,因此中唐以后多次修筑堤塘阻水,使太湖东部免于湖水浸泡,土地渐渐干枯,后来经过农田水利建设,成为广袤的粮田。而吴江塘路最早的基础,应该是在隋初就已奠定。

在运河的周围地区,还修建了一些农田水利工程。江南地区十分重视水利建设,在唐代已是“以塘行水,以泾均水,以滕御水,以埭储水,遇淫潦可泄以去,逢旱岁可引以灌”。^⑭唐代前期,伴随着一些水利工程的修建,荒芜土地逐渐得到开垦,很多农地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地。润州金坛县东南33里有南北谢塘,武德二年刺史谢元超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开挖,能够“溉田径千顷”。^⑮紧邻太湖的湖州乌程县令严谋达,于开元十一年疏通获塘,这是唐代首次在太湖东南方向筑堤浚塘,标志着运河西岸嘉兴湖荡低洼地的开发有了启动的可能性。苏州海盐县唐穆宗长庆前已“有古泾三百一”,虽没有明言这些泾筑于何时,但推测有一部分开挖于唐前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盐官县还有捍海塘,“堤长一百二十四里,开元元年重筑”。^⑯对此,《正德松江府志》认为:“唐开元元年筑捍海塘,起杭州盐官,抵吴淞江,长一百五十里。”^⑰照此理解,唐代修的海塘不仅包括后世说的浙西海塘,还包括一部分江南海塘。因为有运河横贯在中间,所以有条件的地区在沿运河两岸修筑水利工程,使大量农田成为水稻产区。

4、有利于江南城市的发育成长。江南运河是沟通和加强各地区经济联系的纽带,通过航运带来的繁忙,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。比如润州,位于隋唐江南运河北端入江口,北临长江,隔江与扬州相望。处在这样重要的水陆交通路线的关节点上,润州作为两浙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。润州向北可沿运河到达中原,如由润州渡江,经扬州循运河可以到达汴州、

洛阳和长安。润州向西沿长江再往南可达岭南、往北可沿汉水进入中原,西可达剑南益州。润州是江南的重要交通枢纽,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,既是军事重镇,又是漕运的关键部位,“东口要枢,丹徒望邑,昔时江外,徒号神州,今日寰中,犹称列岳”。^④润州之所以经济发展较快,以及政治和军事上极具重要地位,主要与江南运河有关。换言之,随着江南运河的作用日益突出,润州的地位就渐渐显现出来。

江南运河的南端是杭州。杭州向西南通过钱塘江进入岭南、福建,向东经越州、明州可与海相通。钱塘江自杭州向江南西南地区延伸,北可通江南运河,东可进入浙东运河,这样杭州就位于江南水运交织点上,连接着整个江南水运网络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25杭州钱塘县云:“浙江,在县南一十二里。……江源自歙州界东北流经界石山,又东北经州理北,又东北流入于海。”直接受益于钱塘江航道的有歙、衢、婺、睦、杭五州。因此杭州至中唐被人称为“东南名郡”,是“咽喉吴越,势雄江海”,“水牵卉服,陆控山夷,骈檣二十里,开肆三万室”。^⑤杭州能取得这样的一种交通枢纽地位,完全是由江南运河的重要性决定的。

唐前期江南运河交通运输的发达,渐渐促使了在运河两岸出现一些小城市。如永淳元年(682)设立的杭州新城县,垂拱二年(686)常州武进县,垂拱四年(688)润州金坛县、杭州临安县,天授二年(691)湖州德清县,万岁通天元年(696)苏州长洲县,开元五年(717)苏州海盐县,天宝十年(751)苏州华亭县等。县城的设立有种种原因,但与江南运河通航后促进了沿岸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。武进县、长洲县虽然没有建新城池,县衙设在州城中,但设县管理一定程度上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。

可以这么说,江南运河的开凿,促进了唐前期江南经济的发展,江南农业生产、商品经济的发展都与运河交通运输有关。《说郛》卷24引宋代卢襄《西征记》云:“遂念隋大业间炀帝所以浚辟使达于江者,不过事游幸尔。……今则每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,舳舻相衔,朝暮不绝。盖有害于一时,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。天以隋为我宋王业之资也。”卢襄看到了隋代人的辛苦为宋代兴盛带来的好处,其实这条大动脉的作用,对唐前期来说也何尝不是这样。

四、唐朝前期江南社会经济的真实面貌

通常的观点认为江南经济是到了安史之乱以后才有明显的进步。事实是否如此?我们认为,随着隋代和唐初对江南运河的开阔和疏浚,江南运河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水系,从江南到中原的水上航行畅通无阻,这为江南农业、商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较为充足的前进动力。

1. 人口增长远快于全国平均水平

唐朝所处的时代,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不是很高,作为物质基础的社会总产品,是依靠了大量使用劳动力获得的,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大体成正比关系。那么,唐代前期江南的人口状况是怎样的呢?

根据两《唐书·地理志》,可看到贞观十三年(639)江南运河沿线各州的户口数量如下表:

序号	州名	户数	口数	平方公里口数
1	杭州	30571	153720	18.97
2	润州	25361	127104	16.05
3	常州	21182	111606	13.17
4	苏州	11859	54471	3.94

贞观十三年各州的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,我们是参照了翁俊雄先生的研究成果,^⑥由于各州的面积统计或有误差,人口密度仅是一个参考数字。从表格中的数字可以看到,杭、润两州人口密度

较高,常州其次,苏州最低。苏州不但人口总数量较少,而且分布不平均,太湖东部地区在唐初大多是土旷人稀的荒地,这种情况直到开元年间才有所改变。

我们再可观察天宝元年(742)江南运河沿线的各州户口数量:

序号	州名	户数	增长率 %	口数	增长率 %	平方公里口数
1	常州	102631	384.5	690673	518.8	81.5
2	润州	102033	302.3	662706	421.4	83.7
3	苏州	76421	544.4	632655	1061.4	45.8
4	杭州	86258	182.2	585963	281.2	72.3

天宝元年各州的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,我们仍是参照了翁俊雄先生的成果。^④天宝年间,润、常二州人口数量接近,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也接近。苏州尽管人口密度不如杭州,但人口总数已超过杭州。

从贞观到天宝,唐朝全国户数和口数都在增加,其中全国户增长率为 195%,口增长率为 312.7%,而江南运河沿线四州的户增长率为 353.3%,口增长率为 570.7%,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长率。有关专家研究表明,全国人口平均密度最高的是四川盆地、汾渭平原、华北平原,而江南紧接其后。天宝年间,四川盆地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约 145 人,华北平原约为 105 人,京兆地区约为 87 人,^⑤而江南运河沿线四州的人口密度已接近京兆地区,成为全国人口聚集的一个重要区域。

从人口增长的数字可以推测,从贞观到天宝,江南经济的发展必定快于全国平均速度。至天宝时期江南人口的猛增,应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、城市商业发展以及交通发达等综合原因导致的。人口的快速增加,必然会导致经济向前发展,需要更为发达的交通运输业。

2. 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

我曾经作过统计,唐代江南东道(中唐后分为浙西和浙东)共有 96 项水利工程,其中唐前期有 21 项,约占五分之一强。除 1 项时间不详外,其他的 20 项中,高宗武则天时期有 7 项,玄宗时期有 9 项。同样我们以北方较为重要的河南和河东地区作参照,唐前期有水利工程 46 项,其中高宗武则天时期为 15 项,玄宗时期为 11 项。^⑥如果不考虑工程量的大小,只是从数量上看,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,江南兴修的水利工程数量与同时期的北方相比,约在三分之二左右。江南运河沿线的数州,唐前期有多项水利工程已如前述,这些工程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江南水稻生产的发展。

在租庸调制时代,江南每年都有租赋上交政府,不过数量较少。唐代初年,“用物有节而易贍,水陆漕运,不过二十万石”。从江南运往北方的粮食还不是特别多。开元以后,中原粮食缺口增大,需要江南粮食运往北方。裴耀卿改革漕运后,三年间从江南运粮七百万石。以后崔希逸为转运使,每年转运一百八十万石。^⑦

江南种植的水稻,品种日益增多。唐孟诜在《食疗本草》卷下谈到江南有一种粳米“其赤则粒大而香”,其实就是红稻,也称火稻,这种稻“宜人,温中益气,补下元”,是粳稻中一种特别的品种。粳稻在江南十分广泛,“是时粳稻熟,西望尽田畴”,^⑧红稻是其中的精品。孟诜又说:“江南贮仓人,皆多收火稻。”^⑨这里的“收”,意谓收购,见到优质的稻谷,商人是要想尽办法收购谋利。作为商品,江南粮食不断外运各地。《唐国史补》卷中云:“江淮贾人积米以待踊贵,图画为人,持钱一千,买米一斗,以悬于市。”可知江南有很多米商,他们操纵着粮食的价格,赚取极高的利润。杜甫《舟中》谈到他在长江中见到“连檣并米船”,推测其中的一部分必是江南地区的。《后出塞》又云:“云帆转辽海,粳稻来东吴。”^⑩江南的大米通过海道远销到辽东。必须明白的一个事实,不是安史之乱以后江南农业才开始突然发展起来,而是唐前期已经有较高的技术和产量基础。

苏州海塘的修筑,对中唐以后江南农业生产区的拓展意义十分重大,使得太湖东部地区大量的荒地得到开辟。特别是广德年间在太湖东南地区的嘉兴屯田,出现了“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”,“嘉禾一穰,江淮为之康;嘉禾一歉,江淮为之俭”的局面。^⑤可以确定,中唐安史之乱后江南之所以能迅速成为国家重要的财赋之地,与武则天至玄宗年间一系列重要的水利工程的修建密切相关。农业基础打在初、盛唐,而成效显著于广德、大历年间。

3. 城市建设加快了步伐

隋末唐初,由于社会动荡较少,江南城市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建设热潮,不过仍有不少城市的城墙在增筑维修。

杭州城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(591)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93《杭州》云:“十一年,复移州于柳浦西,依山筑城,即今郡是也。”杨素所创杭州城范围,《九域志》云:“隋杨素创州城,周三十六里九十步。”^⑥至唐初,在太湖南岸设立湖州。高祖武德四年(621),越郡王李孝恭新筑湖州城。新筑的湖州城:“罗城东西一十里,南北一十四里。《统记》云:一十九里三十步,折二十四里。”^⑦围绕罗城有护城河,“罗城壕周罗城外,唐武德四年李孝恭筑城时所筑”。子城也有护城河,“子城濠分雷溪支流,自两平桥人桥之西隅,有柱石存。旧可通舟楫,市鱼虾菱藕者集焉”。隋代曾将苏州迁至城西南十多里的横山,“空其旧城”^⑧,不过到了唐武德九年(626),又迁回古城,重加以整修,而城墙其实是沿用六朝的苏州城。

县城的修建比较多见。唐代前期,新修造的县城较多,见于记录的,数量有十多个。如润州丹阳县,一名曲阿,武德五年曾改设简州,三年后废。丹阳城“周五百六十步,高一丈五尺,四面无壕,即古简州城”。^⑨因此丹阳县城修于唐初,虽武德间是作为州城,但规模不大。苏州华亭县设于天宝年间,修建了县城。南宋绍兴年间,曾“得唐燕青妻朱氏墓碑,以咸通八年寔于华亭县城西一里,乡名修竹,是唐之置县,固有城矣”。南宋年间的华亭县,“周回一百六十丈,高一丈二尺,厚九尺五寸”。^⑩宋代并没有修城墙的记录,估计城墙是唐代设县时修建的。常熟县城南朝萧梁时筑,但“武德七年移县治海虞乡,城遂不存”。^⑪宋朝人谈到:“县城,前志云县城周回二百四十步,高一丈,厚四尺,今不存。”^⑫这里说的城墙应该是唐代移城后新修造的。海盐县设于唐开元五年(717),元人谈到海盐县城“周回一百七十步,高一丈二尺五寸,厚一丈,后废”^⑬。此城元朝已废,估计这里的城墙是唐代设县时修筑的。再如常州无锡县,修筑于前朝,但唐代多次加以修建,“旧城下筑濠,阔一丈五尺”^⑭。无锡县城“周七百步,高一丈五尺,唐长寿改元新筑,至万岁通天中甃以砖”。^⑮无锡县有城墙,而且外用包砖,围绕城墙有护城河。杭州盐官县城,高宗永徽六年(655)修筑,“城周四百六十步,高二丈”,城墙外有护城河,“濠阔五丈,深四尺”。^⑯再如盐官县有个古城,“周六百步,高八尺,隋大业十三年筑”,^⑰应是隋末至唐初的盐官县城。

唐朝江南城市大多是沿用六朝和隋朝的旧城,有的小城市甚至没有城墙,比较简陋。在唐代初年,尽管没有出现筑城修城的高潮,但我们仍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城市整修了城墙和护城河系统,使城市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。城市建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往往有一定的关联,所以唐代前期的城市建设,其实足以说明江南经济的发展程度,城市发展对唐后期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起了较为重要的基础作用。

4. 手工业生产特色明显

江南的手工业生产,早在六朝时期已具有自己的特色,“蚕桑麻苧,各尽其方”。^⑱学者认为江南初步形成了冶炼、造船、制瓷、编织、制盐、造纸、制茶等七大手工业,已从单纯的原料型产业向制造型产业阶段发展。^⑲至唐前期,江南手工业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准。

以丝织业为例,江南靠近运河的几个州都出产丝织品,而且都有特殊丝织品。可参下表:

州名	《唐六典》 (开元贡)	《元和郡县图志》 (开元赋) (开元贡)		《通典》 (天宝贡)	《旧唐书》卷 105 (天宝折造贡)
润州	方棋、水波綾	丝	纹綾	方丈綾十四、水文綾十四	京口綾、衫段
常州	紫纶巾		红紫二色绵布		折造官端綾绣
苏州	红纶巾				方丈(文)綾
杭州	白编		绯綾、纹纱	白编綾十四	

如润州丝织业一直位居江南前列,开天时期润州已贡特殊丝织品多种。曲阿人开元进士丁仙芝曾有诗云:“东邻转谷五之利,西邻贩缦日已贵。”说明普通丝织品已经进入流通领域,而这需要以产品的极为丰富作为基础。丁仙芝还谈到江宁县:“长干斜路北,近浦是几家,有意来相访,明朝出浣纱。”^⑧丝织业在民间已相当普及。李白在江宁县时,谈到“吴地桑叶绿,吴蚕已三眠”,^⑨可知盛唐时期润州的养蚕种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。汪篔先生认为唐代前期主要丝织品区有三个,其中吴越是其一,当然他也指出江左的丝织品工妙犹不足与河北、巴蜀地区相比。^⑩汪先生指的吴越,其实主要是指江南东道。唐代前期,江南的丝织业已有较快的发展,唐代中期以后江南丝织业发展的基础是在唐代前期就已建立。

手工业中的麻布纺织,更是唐前期江南重要的手工业。《唐六典》卷 20 太府卿对“诸州庸调及折租等物应送京者”进行了分等,全国的布分为九等,江南几州的调布都在中等以上,其中润州火麻为第一等,常州苧布为第二等,苏、杭的苧布列第四等。池田温先生根据大谷文书 3083、3044、3048 所录《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录文》,谈到布行中有常州布和火麻布:“常州布壹端,上直钱伍伯文,次肆伯玖拾文,下肆伯捌拾文;杂州布壹端,上直钱肆伯伍拾文,次肆伯文,下叁伯捌拾文;火麻布壹端,上直钱伍伯文,次肆伯玖拾文,下肆伯捌拾文。”^⑪录文中普通的布统称“杂州布”,明显低于常州布的价格,其中上等布低于常州布 10%,中等布要低 18.5%,下等布要低 20.9%,说明常州苧布的质量在西州特别有竞争力。润州是生产火麻布的地区之一,西州市场上的火麻布应该有一部分是润州的,同样这种布价格坚挺,受到西北地区人们的喜爱。

这几州都有布作为贡和赋,我们可从一些资料中看出大概:

州名	《唐六典》		《元和郡县图志》		《通典》
	开元贡	开元赋	开元贡	开元赋	天宝贡
润州		火麻		苧布	
常州	苧布	苧	细苧	苧布	细青苧布十四
苏州		苧		苧布	丝葛十四
杭州		苧		苧布	

江南运河沿线数州不但布的等级很高,而且生产区域十分广泛,产量很大。《通典》卷 6《食货典六·赋税下》云:“(开元二十五年令:)其江南诸州租,并回造纳布。”从开元二十五年开始,江南大部分州田租折纳成布,转漕至北方。杜佑又说:“按天宝中天下计帐……课丁八百二十余万……约出布郡县计四百五十余万丁,庸调输布约千三十五万余端。其租:约百九十余万丁江南郡县,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。二百六十余万丁江北郡县,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。”在天宝计帐中,江南的丁数,约占全国总丁数的 23.17%,是全国纳布人数的 42.2%,是全国输布总量的 55.07%。虽然这个数据中杜佑说的“江南”比较宽泛,但足可说明江南在全国的重要地位。

对唐前期江南地区人口增长、农业发展、城市建设、手工业生产几个基本方面的描述,不难看

出,唐前期江南经济的基础是比较稳固的,经济的总量已有很大的规模。随着江南运河的作用越来越突出,江南经济崛起的基础条件大体具备,只要有合适的时机,江南经济就会迈开快速发展的步伐。

五、结 论

通过上述对隋末唐初江南运河历史的探讨,我们可以看到,隋朝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江南运河进行了疏浚。运河的工程量不是很大,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不是十分剧烈,因而社会对其反应很小。不过隋朝疏通、深挖、开阔了河道,对江南运河整个交通运输体系进行了建设。虽然运河建在隋朝,然隋朝并没有享受到这条河流带来的益处,倒是唐朝及后代产生的作用很大。

唐代前期,运河沿线各州继续完善运河的功能,并对交通运输中渐渐显露的一些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解决。唐朝人认识到运河的重要性,因而对运河的修缮工程不断,确保了运河能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。运河的畅通,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水系,将江南和淮南、中原连成一体,江南对全国的意义逐渐显现出来。运河在唐前期,对粮食和各种物资的运输、对各种人员的往来、对农业灌溉和水稻种植、对沿河城市的发育成长,其作用越来越直接。运河对江南经济发展的推动,直接导致了唐前期江南经济已建立起稳定的发展基础。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,唐前期江南经济的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准。安史之乱后,中央政府把财赋中心移到了江南,南方大量粮食运向北方,成为“国用大半”的财赋基地,所谓“犖越而衣,漕吴而食”局面的形成,^⑩没有唐前期奠定的发展基础,中唐以后是不可能轻易出现这种局面的。

以往,我们一直认为江南的开发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情,而事实上,就如上面所引杜佑的数据告诉了我们,江南丁口和布纺织经济,在唐前期已占全国四分之一强,江南的经济实力在悄悄地上升。

唐前期的江南,经济发展十分快速,与江南运河的促进作用是密不可分。这是我们在谈论江南经济发展时,不能忽略的一点。

注释与参考文献:

- ①权德舆:《权载之文集》卷47《论江淮水灾疏》,四部丛刊初编本。
- ②韩愈著,马其昶校注: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卷4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,第231页。
- ③杜牧:《樊川文集》卷14《赠吏部尚书崔公行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,第210页。
- ④魏嵩山、王文楚:《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79年第二辑。
- ⑤许辉:《历经沧桑的江南运河》,《运河访古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,第257页。
- ⑥王鸣盛:《十七史商榷》卷42《三国志四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,第305-306页。
- ⑦陆游:《入蜀记》卷1,《全宋笔记》第五编第八册,大象出版社2012年,第164页。
- ⑧朱长文:《吴郡图经续记》卷下《往迹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,第59页。
- ⑨孙忠焕主编:《杭州运河史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,第27页。
- ⑩沈约:《宋书》卷54《孔季恭传》后论,中华书局1962年,第1540页。
- ⑪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卷181 炀帝大业五年三月,中华书局1956年,第5644页。
- ⑫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卷180 炀帝大业元年三月,中华书局1956年,第5618页。
- ⑬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卷180 炀帝大业二年二月,中华书局1956年,第5623页。
- ⑭乐史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89《江南东道一·润州》,中华书局2007,第1760页。
- ⑮俞希鲁:《至顺镇江志》卷2《闸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,第50页。
- ⑯彭定求:《全唐诗》卷882,宋之问《登北固山》,中华书局1960年,第9967页。
- ⑰彭定求:《全唐诗》卷118,中华书局1960年,第1193页。
- ⑱卢宪:《嘉定镇江志》卷21《纪异》引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1990年,第2537页。
- ⑲《新唐书》卷41《地理志五》润州丹徒县下云:“(开元二十二年刺史齐浣)乃于京口埭下直趋渡江二十里,开伊娄

河二十五里,渡扬子,立埭,岁利百亿,舟不漂溺。”据此,开元所立为伊娄埭,而京口埭的设立在之前。齐浣任润州刺史的时间在开元二十五年,《新唐书》这里的记载应该有误。

- ⑳《咸淳毗陵志》卷15《堰》引《祥符经》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1990年,第3100页。《无锡志》卷2《总水二之二》云:“溪侧有将军堰,今构石梁于上,遗址尚存。……《风土记》云:‘唐景龙三年置堰,堰旁有梁萧将军墓,宋嘉祐中开运河,通梁溪,取太湖水,堰遂废。’……旧有闸,今废。”
- ㉑董诰:《全唐文》卷370,刘晏《奏禁隔断练湖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第1664页。
- ㉒董诰:《全唐文》卷871,吕延桢《复练塘奏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第4041页。
- ㉓刘昫:《旧唐书》卷190中《齐浣传》,中华书局1975年,第5038页。
- ㉔李白著,瞿蜕园、朱金城校注:《李白集校注》卷25《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,第1440页。
- ㉕彭定求:《全唐诗》卷615,中华书局1960年,第7099页。
- ㉖刘昫:《旧唐书》卷94《崔融传》,中华书局1975年,第2997-2998页。
- ㉗房玄龄:《晋书》卷62《祖逖传》,中华书局1962年,第1694页。
- ㉘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卷177隋文帝开皇九年正月条,中华书局1956年,第5504-5505页;《隋书》卷52《贺若弼传》,中华书局1973年,第1344页。
- ㉙魏徵等:《隋书》卷48《杨素传》,中华书局1973年,第1284页。
- ㉚彭定求:《全唐诗》卷615《汴河怀古二首》,中华书局1960年,第7099页。
- ㉛彭定求:《全唐诗》卷508,李敬芳《汴河直进船》,中华书局1960年,第5776页。
- ㉜河南省博物馆、洛阳博物馆:《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》,《文物》1972年第3期。
- ㉝欧阳修等:《新唐书》卷53《食货三》,中华书局1975年,第1366页。
- ㉞董诰:《全唐文》卷297,裴耀卿《请缘河置仓纳运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第1333页。
- ㉟周绍良:《唐代墓志汇编》天宝一三七《太原王夫人墓志铭并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,第1628页。
- ㊱钟谝:《前定录》“延陵包隰”条,《全唐五代笔记》,三秦出版社2012年,第924页。
- ㊲李翱:《李文公集》卷18《来南录》,四部丛刊本。
- ㊳白居易:《白居易集》卷27《想东游五十韵》,中华书局1979年,第607页。
- ㊴沈彤、倪师孟:《乾隆吴江县志》卷41《治水一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,第192页。
- ㊵朱长文:《吴郡图经续记》卷下《治水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,第51页。
- ㊶顾祖禹: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25《江南七·镇江府》,中华书局2005年,第1267页。
- ㊷欧阳修等:《新唐书》卷41《地理志五》,中华书局1975年,第1058页。
- ㊸陈威:《正德松江府志》卷3《水下》,《上海府县旧志丛书·松江府卷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,第50页。
- ㊹周绍良:《唐代墓志汇编》垂拱〇五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,第765页。
- ㊺董诰:《全唐文》卷316,李华《杭州刺史厅壁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第1417页。
- ㊻翁俊雄:《唐初政区与人口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,第96、286页。
- ㊼翁俊雄:《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》,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,第204-205页。翁先生的研究认为从贞观到天宝,润州、常州、苏州的行政区划没有作过变动,而杭州从贞观时的14366平方公里,到天宝时仅为8104平方公里。
- ㊽费省:《唐代人口地理》第四章《唐代人口分布》,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,第87、94页。
- ㊾张剑光:《关于唐代水利建设重心的一些思考——以浙东、浙西和河南、河东四道为核心》,《山西大学学报》2012年第4期。
- ㊿欧阳修:《新唐书》卷53《食货志三》,中华书局1975年,第1365-1367页。
- ①彭定求:《全唐诗》卷189,韦应物《送张侍御秘书江左觐省》,中华书局1960年,第1929页。
- ②孟诜著,郑金生、张同君译注:《食疗本草译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,第206页。
- ③彭定求:《全唐诗》卷232,中华书局1960年,第2560页;卷18,第186页。
- ④董诰:《全唐文》卷430,李瀚《苏州嘉兴屯田纪绩碑颂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第1937页。
- ⑤周宗:《乾道临安志》卷2《城社》引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1990年,第3223页。
- ⑥谈钥:《嘉泰吴兴志》卷2《城池》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1990年,第4686页。

- ⑤7朱长文:《吴郡图经续记》卷下《往迹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,第58页。
- ⑤8俞希鲁:《至顺镇江志》卷2《城池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,第10页。
- ⑤9杨潜:《云间志》卷上《城社》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1990年,第7页。
- ⑥0凌万顷:《淳祐玉峰志》卷上《城社》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1990年,第1055页。
- ⑥1孙应时:《琴川志》卷1《县城》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1990年,第1154页。
- ⑥2徐硕:《至元嘉禾志》卷2《城社》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1990年,第4424页。
- ⑥3佚名:《无锡志》卷1《城关一之六》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1990年,第2189页。
- ⑥4卢宪:《嘉定镇江志》卷2《城池》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1990年,第2336页。又据《咸淳毗陵志》卷3《城郭》(第1982页)云:“无锡城周回二里十九步,高二丈七尺,四郭周回十一里二十八步,高一丈七尺,门皆有屋。”意谓无锡城有子城和罗城,各有城墙,城门上有城楼。
- ⑥5潜说友:《咸淳临安志》卷18《城郭》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1990年,第3537页。
- ⑥6潜说友:《咸淳临安志》卷18《城郭》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1990年,第3537页。
- ⑥7沈约:《宋书》卷5《文帝纪》,中华书局1962年,第92页。
- ⑥8简修炜等:《六朝史稿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,第144页。
- ⑥9彭定求:《全唐诗》卷114《赠朱中书》、《江南曲》,中华书局1960年,第1155、1157页。
- ⑦0李白著,瞿蜕园、朱金城校注:《李白集校注》卷13《寄东鲁二稚子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,第858页。
- ⑦1汪篔:《隋唐时期丝产地之分布》,载《汪篔隋唐史论稿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,第297页。
- ⑦2转录自池田温《中国古代物价初探——关于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断片》,文载刘俊文主编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第四卷,中华书局1992年,第454页。
- ⑦3董浩:《全唐文》卷630,吕温《京兆韦府君神道碑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第2816页。